

李葆嘉 著

现代汉语析义元语言研究

语义语法学研究系列

李葆嘉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汉语析义元语言研究

李葆嘉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析义元语言研究/李葆嘉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3.02

ISBN 978-7-5100-5660-4

I. ①现… II. ①李… III. ①汉语—语义分析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4990 号

现代汉语析义元语言研究

著 者: 李葆嘉
责任编辑: 夏 丹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38355)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 22
字 数: 480 千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5660-4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语言科技文库》总序

李葆嘉

当代语言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科学与技术的互补时代，信息处理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知识世界的载体是语符系统，信息处理的根本对象是语言信息处理。与计算机的出现使得语言符号有可能成为数据处理对象相似，神经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的应用，使得在大脑神经层面探讨语言机制成为可能。这些无疑都引导语言研究走向科技化，“语言科技新思维”（李葆嘉 2001）应运而生。所谓“语言科学”包括理论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分支学科，所谓“语言技术”指语言研究的现代技术手段，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音实验分析，以及语言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实验分析的技术手段等。就语言信息处理而言，又可以分为语料库研制技术、知识库研制技术、知识挖掘和抽取技术、句法信息处理技术、词汇信息处理技术、语音信息处理技术、语义信息处理技术、语用信息处理技术等。

2001 年 5 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创办了史无前例的“语言科学与技术系”，率先迈出了从传统文科教育范型向现代科技教育范型转变的步伐。“十五”期间，南京师大“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语言信息处理与分领域语言研究的现代化”（陈小荷教授主持），以基础平台建设、资源建设和理论探索等为主，迈出了语言科技研究的一大步。

“十一五”期间，南京师大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联袂申报“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该项目以“语言科技”为引导，以“多学科交叉、跨院系整合、开放型营运”为理念，建设具有前瞻性、原创性、成长性的语言科技高级工作平台。以典型课题的工作原理为核心，进行资源开发和系统研制，拓展语

音科技、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言语能力受损儿童的语言能力研究等新方向。同时造就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和培养一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以期形成一支高水平的交叉学科团队。该项目设计，体现了工作平台建设、理论创新、应用研究、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的学科发展一体化思路。其旨趣在于，加速语言研究从传统文科范型向现代科技范型的转变，以引领 21 世纪语言科技的新潮流。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项目，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匿名评审，“语言科技创新及工作平台建设”（2008—2011）获批，总投入 1 000 万元。总体而言，这一“语言科技创新”团队，分支学科齐全，专业知识互补。涵盖了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义科技、语音科技、实验方言学、历史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二语习得研究、话语行为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期间，项目组成员获批的国家级基金项目达 20 多项。该项目理念之前瞻、实力之雄厚、工程之浩大、经费之保障，为学界瞩目。

2008 年秋，本项目以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为实施单位正式启动。主要有三大任务：建设一个领先性的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立一个独创性的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撰著一套有特色的语言科技文库。

从实验室方案设计到设备招标采购，再到实验室用房改造，经过 8 个月的努力，2009 年 12 月，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成，为语言研究从传统范型向科技范型的转变提供了基本保障。该实验室划分为实验工作区、科研工作区和管理服务区。实验工作区建有语音实验与计算室、神经认知实验与计算室、课堂话语实录室三个专门实验室。科研工作区建有语义科技工作室、语音科技工作室、方言实验工作室、知识工程工作室 I（先秦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 II（中古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 III（敦煌俗语言文字）、语言习得神经机制工作室、语言习得中介机制工作室，以及参研工作室。管理区服务包括办公室、管理室、编辑室和交流室。出席“语言科技高层论坛暨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落成仪式”（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专家认为，该实验室体现了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当代性和先进性，具有整体性、科技型、开放型三个特点，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语言科技新思维”的又一体现。同时认为，该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涵

盖了四个二级学科、四个博士学位点，有稳定明确的研究方向，有合理的设计规划和很好的科研基础；整体设计合理，功能齐备。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标准衡量，很多方面超过了指标。

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是基于工作原理（课题定位—理论方法—技术路线—关键技术—评估方式）而建设的高级平台。一方面，从语言信息、语言知识和语言机制三个层面，围绕典型课题进行设备配置、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一方面，将典型课题研究与工作平台建设融为一体，依据典型课题建设的子平台应具有解决同类课题的功能。

建设语言科技工作平台的目标是要实现语言研究手段的技术化和模型化，总体设计包括三个二级平台和八个子系统。

一、语言信息工作平台 1. 语义科技工作系统（李葆嘉教授主持）：基于词汇语义—句法语义的一体化研究思路，开发“人一机交互语义标注工具”，研制“深度语义标注信息库”；研制“幼儿（2~6）日常话语跟踪语料库”，完成幼儿语义系统和话语行为分析研究。2. 语音科技工作系统（顾文涛教授主持）：研制“多语言、多语境、多语用的语音语料库”，基于声学信号分析、感知实验和数学建模，完善语音韵律理论与相关技术应用。3. 方言实验工作系统（刘俐李教授主持）：完成“网络版汉语方言有声语料库”，拟定系统的可操作性语音、词汇、语法实验模型和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新兴交叉学科“实验方言学”。

二、语言知识工作平台 1. 先秦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陈小荷教授主持）：研制“先秦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先秦文献自动分词算法、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算法、同指专名检索软件工具等，完成“先秦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2. 中古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董志翘教授主持）：研制“中古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中古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中古文献自动分词和标注工具等，完成“中古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3. 敦煌俗语言文字统计与检索系统（黄征教授主持）：研制“敦煌文献资料库”、“敦煌文献俗词语档案库”，开发相应工具，完成“敦煌文献资料与知识检索”。

三、语言机制工作平台 1. 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系统（倪

传斌教授主持):研制“英语受蚀词汇库”等,基于行为学、脑成像和脑电三维度模型,进行中国人英语习得与磨蚀的神经机制研究,完成“基于神经机制的英语个性化学习分析系统”。2. 二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系统(肖奚强教授主持):研制“留学生汉语口语中介语语料库”,基于中介语理论、对比分析理论、偏误分析理论以及二语习得影响因素等,完成“留学生汉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

这一工作平台,既是科技研究平台,也是人才培养平台,即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体系。

作为本项目的文本成果,《语言科技文库》包括计算语言学研究、语义语法学研究、汉语方言学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新专题研究六个系列。其总体特征为:领域的开拓性、理论的原创性、选题的新颖性、方法的交叉性、考据的精确性、成果的应用性。在研究过程中,除了数据采集分析、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材料。陈小荷提出的先秦文献信息处理新方法,从先秦典籍注疏文献中挖掘出用于自动分词和词义消歧的知识,再注入已开发的古汉语分词和词性标注工具中去,所取得的先秦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先秦词汇知识自动挖掘等成果均具开拓性。李葆嘉提出的语义语法学理论和话语行为理论,基于研制专用语料库或语义信息库和技术手段,开拓了语义网络建构、深度语义分析和话语行为研究等新的领域。刘俐李建构的实验方言学理论和方法,为方言学向现代科技方法的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黄征多年来从事敦煌文献及其俗词语文字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系列中的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以及敦煌写本字词考释、以古佚和疑伪经为中心的敦煌佛典词语和俗字研究、两汉声母系统研究等新见迭出。肖奚强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二语习得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已经产生了影响。钱玉莲的汉语介词与相应英语形式比较研究等专著各有亮色。倪传斌依据语言测试和认知实验等数据,从行为学、生理学和语言学三个层面分析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外语磨蚀的相关因素。刘宇红基于隐喻的理论探讨,对各类隐喻形式的结构、特性和解读规律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入探讨。

《语言科技文库》所收论著,由作者在2008年12月申报选题,

2011 年始逐步完稿。系列主编审读了书稿，主要就其学术价值、章节安排、内容关联、行文表述、图表绘制等方面，提出审阅意见。此后，作者们对书稿又进行了修改和润色。《语言科技文库》的作者，大多数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对于我们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走进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而言，出版论著可能已不足为道。然而，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其论著的出版既是几年来研究的结晶，也是对其继续探索的促进。换言之，“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年轻教师搭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和教学平台。学科带头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携后进。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或学术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探索行为，然而复杂问题的研究，无疑需要群体协作。“学科建设”或团队合作模式，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这种模式涉及总体规划、多方协调，是需要付出精力和心血的。2008 年，通过投票方式推举我担任该项目总负责时，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劳动班委”。2009 年，前往安徽大学拜访黄德宽教授时，曾谈到“学科负责人的任务就是规划设计，争取项目经费和提供科研设备设施”，得到黄教授的赞许。2010 年，申报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评审专家柳士镇教授提问的“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项目，各学科之间的协调是怎么考虑的，有什么做法”，可谓一语中的。作为后学，深知交叉研究之艰、学科整合之难。相关学科之间的整合协调需要借助行政机制，但凭借行政方式并非就能完成。当时的回答是，目前做到的是建成了一个可以合作研究的场所，至于学科之间的进一步沟通合作应有较长过程。有一点很明确，只有通过交叉项目，相应学科才能渗透，合作者才能逐步磨合。我们只是在一步步探索。

“十一五”期间的“211 工程”建设项目即将完成，但是学科建设的任务并没有结束。2010 年，“语言信息科技研究中心”被评审为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语言科技”这一交叉领域注入了新的建设活力。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除了“跨院系整合、多学科交叉、开放型运行”理念，需要凸显“合作性攻关”。围绕交叉性项目，实施计算语言学、语音科技、神经语言学、语义科技等力量的联合攻关计划。只有通过全面开放以及和与国内

外同行的合作交流，才有望建成具有影响的语言科技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基地。

十年前，我（2001）曾写道：“语言科技”的内涵是以理论研究为指导，以描写研究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枢纽，促使语言研究向计算机应用、认知科学和现代教育技术领域等延伸，沟通文理工相关学科以实现语言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技术化。“语言科技”的外延为语言工程科技、语言教育科技和语言研究科技。其中，“语言研究科技”是将语言研究活动与资源建设、软件开发相结合，其目标是实现语言学自身的科技化。还应包含语言实验、数据处理这些实验语音学、神经语言学研究的科技手段。

虽然语言学家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转向语言计算或实验研究，尽管描写、考据和内省始终是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具有一定的语言科技意识却非常必要。语言学家只有了解有哪些可供利用的资源、软件或仪器，才能提高其研究深度、精度和效率。语言学家也只有了解到信息处理的语言研究需求，才有可能为之提供可资应用或参考的基础成果。“语言科技”是 21 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潮流。

此为出版缘起。是为总序。

2011 年 8 月谨识于南都

有人把语义比作“流沙”，有人把语义比作“泥潭”，有人把语义比作“黑洞”，成长中的南京语义学派的口号是——穿越语义研究的“沼泽地”。

——作者手记

目 录

引 论 语义分析与语言知识工程	1
第一节 词汇语义分析的三块基石	5
第二节 国际上著名的语义分析理论	22
第三节 国际上著名的语言知识工程	42
第四节 中文信息处理的语言知识工程	62
第五节 基于日常感知的深度语义分析	117
第一章 析义元语言研究的理论及其操作	135
第一节 义征分析的困惑及其思考	135
第二节 析义元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	152
第三节 析义元语言研究的操作步骤	164
第二章 具体名物词的义征挖掘	173
第一节 常用人类名词的义征挖掘	173
第二节 常用生物名词的义征挖掘	190
第三节 常用事物名词的义征挖掘	216
第四节 常用食物名词的义征挖掘	227
第五节 常用用物名词的义征挖掘	241
第三章 肢体动作词的义征挖掘	265
第一节 肢体动作词的筛选及其分类	265
第二节 上肢示意动作词的义征挖掘	270
第三节 手部凸显动作词的义征挖掘	273
第四节 手臂凸显动作词的义征挖掘	286
第五节 下肢移动动作词的义征挖掘	293
第六节 下肢定势动作词的义征挖掘	297
第七节 足部凸显动作词的义征挖掘	298
第四章 常用性质词的义征挖掘	301
第一节 性质词的界定及其分类	301

第二节 人类性质词的义征挖掘	316
第三节 事物性质词的义征挖掘	330
第四节 事件性质词的义征挖掘	344
第五节 时空性质词的义征挖掘	350
第六节 境况性质词的义征挖掘	351
第五章 形貌类别词的义征挖掘	355
第一节 名物类别词的界定及其分类	355
第二节 长条形类别词的义征挖掘	361
第三节 平展形类别词的义征挖掘	372
第四节 圆弧形类别词的义征挖掘	379
第五节 颗粒形类别词的义征挖掘	381
第六节 堆捆形类别词的义征挖掘	385
第七节 丛群形类别词的义征挖掘	388
第八节 组配形类别词的义征挖掘	391
第六章 动作类别词的义征挖掘	397
第一节 动作类别词的筛选及其分类	397
第二节 动作过程类别词的义征挖掘	408
第三节 动作工具类别词的义征挖掘	412
第七章 范围、时态、程度词的义征挖掘	419
第一节 传统副词的筛选及其分类	419
第二节 常用范围副词的义征挖掘	425
第三节 常用时体副词的义征挖掘	434
第四节 常用程度副词的义征挖掘	451
第八章 析义元符号集与元句法的探索	460
第一节 析义元语言符号的梳理和验证	461
第二节 元语言符号的普适性和民族性	473
第三节 名物词、代名词的析义元句法	477
第四节 性质词、状态词的析义元句法	480
第五节 数量词、类别词的析义元句法	481
第六节 动作词、副词的析义元句法	485
参考文献	489
后 记	505

语言像现实世界的地图，
而并非现实世界本身。

引 论 语义分析与语言知识工程

语义研究起源于对意义的思考。毋庸置疑，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语义研究都比语法（狭义的词法—句法）研究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总体而言，西方语义研究的轨迹，从原初的哲学语义研究，历经词源学（Etymology）、文献语言学（Philology）、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而演变为现代语义学（Modern Semantics）。

汉语词汇语义的研究具有悠久传统。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尔雅》就是一部根据日常义类编排而成的字典，而许慎的《说文解字》（100—121）则根据部首（义类符号）进行语义分类，成为人类学术史上的第一部词汇语义学专著。就西方而言，而意义的思考则肇始于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人的“名实之争”。争辩的焦点是事物的名称是由自然决定，还是受惯例支配，由此形成了按自然属性命名的“自然派”（Physis）和按人为惯例命名的“约定派”（Nomo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30—前470）主张，名称与事物“自然”结合而成。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460—前370）则认为，名称出于无规可循的约定。克雷特利斯（Cratylus）坚持，名称源于人所受到的“自然刺激”，具有“与生俱来的合适性”。赫莫吉尼斯（Hermogenes）则强调，除了出于“习惯和习俗之外”，没有任何事物的名称具有天然的合适性。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提出“名称标签”说，不管是按自然本质还是按人为约定，词语都是贴在事物上的标签。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则提出“词语意义”说，在语言 and 现实之间存在“思想”这一中介，词语是“有意义的声音”，并且提出了词语的“十范畴说”。公元前3世纪，斯多噶学派（Stoics School）继承了自然派的观点，而亚历山大里亚学派（Alexandrian School）则维护了约定派的思想。

斯多噶学派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因此词语虽然与现实世界有关但事物本身不等同于词义，词与物之间存在着感觉的心理映象。克拉底斯（Krates）强调词与物并不对应，由此提出语言是天然形成而不受规则制约的“非系统”现象。作为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代表人物，亚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约前310—前230）则提出了“类比”说，语言用相似的形式指代相似的范畴，不但具有系统和规则，并且受制于一定的规律。

作为亚里斯塔库斯的弟子，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前2—前1世纪之间）将柏拉图以来的语法研究系统化，建构了古希腊语法学模式。在特拉克斯看来，“语法”就是“有关诗人和文学家使用语言的 actual 知识”。作为西方语法学的原典，特拉克斯的《读写技艺》（*Téchnē Grámmatiké*）包括语音韵律、词语解释、熟语讲解、词源探讨、类比规则归纳和文学作品评价六个部分。其中的“词语解释、熟语讲解、词源探讨”都属于语义研究。此外，特拉克斯确定的古希腊语词类系统，从语义（范畴含义）、语形（形态变化）和功能（句法作用）等方面加以多角度的定义。公元2世纪，倾向于心灵主义的狄斯科鲁斯（A. Dyscolus）在《论句法》（*Peri Syntaks-eos*）中，一方面区分了词语的形式（schema）和意义（ennoia），一方面主张根据词汇意义进行词语分类。

作为克拉底斯的三大传人之一，古罗马语言学家瓦罗（M. T. Varro，前116—前27）继承了斯多噶学派的希腊语法研究传统。在《论拉丁语》（*On the Latin Language*）中，瓦罗将拉丁语语法研究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部分，词汇语义研究包含在词源学之内。这一划分方法，成为西方语言学的传统模式。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句法研究的兴起，西方语言学才形成了语音学（Phonology）、形态学（Morphology）和句法学（Syntax）的三分格局。^①

作为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西方语义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德国。1825年，德国古典文献学家瑞希格（C. K. Reisig，1792—1829）在《拉丁语言学讲稿》（1839年初版于莱比锡）中主

^① 详见李葆嘉《中国转型语法学·第一章·泰西眼光：多明我传统和西洋汉语文法学的三变》，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张将语法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句法学和语义学 (*Semasiologie*) 三个分支, 其中语义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词汇语义及其演变 (属于历史语义学研究)。由此可见, 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 (M. Bréal, 1832—1915) 使用的 *La Sémantique* (法语的“语义学”) 这一术语有其学术渊源。

1866 年到 1905 年, 布雷阿尔在法兰西大学担任比较语法学 (*Comparative Grammar*) 教授。1878 年, 在他给 Angelo de Gubernatis 的书信中, 已经出现了 *La Sémantique* 这一用语; 1893 年, 在《语言的知识规律》(*De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vivantes*) 中正式使用了 *La Sémantique* 这一术语; 1897 年出版的专著《语义学: 意义的科学》(*Essai de Sémantique: Science des Significations*), 被认为是西方语义学成为独立学科, 或创立“科学语义学”的里程碑。

1894 年 12 月 27 日, 美国哈佛大学梵文教授朗曼 (Charles R. Lanman) 在美国语文学会上宣读了论文《映射的意义: 语义学要点》(*Reflected Meanings: A Point in Semantics*), 并且提出: “研究词汇意义发展过程的学说可以称之为 Semantics 或者 Semasiology”。很显然, 朗曼的 Semasiology 与瑞希格的术语一致。

1896 年, 俄国语言学家波科罗夫斯基 (М. М. Покровский, 1868—1942) 在其《语义学方法论》(*О методах семасиологии*) 中也已经使用了 Семасиологии (俄语的“语义学”) 这一术语。他指出: 事物在现实中的联系决定了相应词语在语言中的联系, “一个词的意义史, 只有在研究这个词与其他与之同义的词, 尤其是同属一个现象范围内的词的联系时才能了解”。1908 年, 瑞典语言学家诺伦 (A. Noreen, 1854—1925) 首次提出“义位” (Sememe) 这一概念, 其七卷本巨著《我们的语言》(*Vårt språk*, 英文 *Our Language*, 1903—1924) 包括了语音学、语义学、形态学研究三部分。诺伦尤其主张建立不同等级的语义格, 而成为句法语义研究的先驱。1908 年, 丹麦语言学家耐洛普 (K. Nyrop, 1858—1931) 在《法语语法学史》(*Gramm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中已经尝试探讨法语的词汇语义特征。20 世纪 30 年代, 比利时语言学家布伊森 (E. Buyssens) 受人类语言学和索绪尔心理主义的影响, 导入并定义了“义素” (seme) 这一概念。与之同时, 苏俄语言学家别什科夫

斯基 (A. M. Пешковский, 1878—1933)^① 也曾提出过词义可分解为独立成分的观点。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的德国, 通过“新洪堡特主义”代表人物伊普森 (G. Ipsen)、特里耶 (J. Trier) 和波尔齐希 (W. Porzig)、魏斯格贝尔 (L. Weisgerber) 的共同努力, 义场理论终于建立起来。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 作为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 (K. Davis) 利用“基元要素” (primary elements) 和矩阵图分析了亲属称谓。由此可见, 最早的义场理论是新洪堡特主义的产物, 最早的语义成分分析是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产物。换言之, 所谓“结构主义语义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其实并非“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的成果。

尽管此后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的叶尔姆斯列夫 (L. Hjelmslev) 在《语言理论绪论》(1943) 中提出, 语言的内容平面可以通过替换方法, 分析出数量有限的最小“内容形素” (éléments de contenu), 然而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 法国语言学家波蒂埃 (B. Pottier)、克歇留 (E. Coseriu) 和格雷马斯 (A. Greimas) 才提出在词汇场中由功能对立加以区别的“词汇要素” (lexical elements), 语言学的义征分析才得以充分发展。内容形素、词汇要素的分解思路, 接受的是布拉格功能音位学派对立特征分析法的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英国学者发展了语义学理论。莱昂斯 (J. Lyons) 的《结构语义学》(1963), 以结构主义理论阐述词汇意义研究, 主张词语的意义可以界定为词语参与的意义关系的总集合, 使用了系统意义关系 (sense relations) 这一术语, 从而形成了关系语义学 (Relational Semantics)。

语义学领域先后出现了众多流派或分支。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 出现了人类语义学 (Anthropological Semantics)、逻辑语义学 (Logical Semantics); 60 年代, 出现了解释语义学 (Interpretative Semantics)、生成语义学 (Generative Semantics); 70 年代, 出现了词汇语义学 (Lexical Semantics)、形式语义学 (Formal Semantics); 80

^① 别什科夫斯基是俄语语义句法学研究的先驱, 代表作是《科学阐述的俄语句法》(1914)。

年代,出现了框架语义学 (Frame Semantics)、认知语义学 (Cognitive Semantics); 90 年代,出现了计算语义学 (Computational Semantics) 和情境语义学 (Situation Semantics) 等。

“语义学、词汇学、词汇语义学”这三个术语密切相关。1825 年,瑞希格提出了 Semasiologie (语义学) 这一术语。1828 年,魏伯斯特 (N. Webster) 根据古希腊词根 lexikon, 新造了 lexikonology (词汇学) 这一术语。^① 而“词汇语义学”这一术语,可能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才出现的。80 年代前,英国语言学家帕尔默《语义学》(1976) 的第四章、第五章标题是 Lexical Semantic。90 年代,克鲁斯的专著用《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 1986) 为书名。而在此前,苏俄语言学家阿普列相 (Ю. Д. Апресян) 1974 年完成的专著《词汇语义学: 语言的同义手段》,已用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词汇语义学) 这一术语。除了词汇语义学与句子语义学 (Sentence Semantics), 也有人进一步提出了短语语义学 (Phrasal Semantics)、语篇语义学 (Textual Semantics) 等。短语语义学可以包括在词汇语义学之内,而语篇语义学则可以归入句子语义学。仅就研究对象而言,现代语义学实质上可分为词汇语义学和句子语义学两大分支。

第一节 词汇语义分析的三块基石

尽管通常把现代语义学的第一个流派称之为“结构(主义)语义学”,尽管通常认为结构语义学包括义场理论、语义特征分析方法以及关系语义理论,然而,除了关系语义理论来自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前两者并非如此。

一、词汇语义分析的第一块基石

现代语义学的第一块基石,无疑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德国学者创立的义场理论。这一理论的萌芽,可以追溯至洪堡特 (W. von Humboldt) 的人文语言学思想。在其《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6) 中,已经出现了类似“义

^① 汪榕培《英语词汇学: 历史与现状》,《外语研究》2001 年第 9 期。